

从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到社会文化史

张立程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年鉴史学致力于建构全球总体史,强调经济、社会、地理等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形成宏观史学的范式;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学则以细微、具体的人或事,阐幽发微,深描重叙,力图纠年鉴史学之偏;新文化史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力图解构现代性的权威,由此带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因社会重心的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相继复兴,由此产生社会文化史这门史学新兴分支,与西方史学研究对象日趋细微,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向渐趋一致,史学在微观层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碎片化”现象反映的是目前史学研究深入精深的现实,未来必然会在具体、细微的研究之上,走向更高层次的宏观的整体研究。

一、年鉴史学到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学

19世纪,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兰克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性,史学家的任务是要以客观的态度考订文献资料,来书写民族国家的政治史、传记史。这导致史学研究的领域过于窄化,其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质疑和诟病。以布洛赫、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法国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病,提倡研究社会总体史,强调对历史进行分析解释,展开扩学科综合研究,大力开拓史料的范围,确立了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在法国开启了对全球史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史学”运动。以1929年创办《年鉴》杂志为标志,年鉴学派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学派。

年鉴学派的治史思想主要体现在总体史思想、跨学科方法、长时段理论及问题史意识。

所谓总体史,就是反对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史学,呼吁研究包括人类社会各层次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精神心态等均位列其中。布洛赫声称“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费弗尔强调“整个社会的历史”,“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从而将史观建立在人本主义观念基础之上。

作为年鉴学派的宗师,布罗代尔的主要代表作以总体史观作为指导原则,《地中海》、《物质文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从地理环境、多维时空社会结构有机结合等角度,体现其总体史观,特别是强调“结

构”的总体史。他所指的总体史就是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三位一体。

总体史观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也相应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并促使年鉴学派对历史进行多元解释,避免了传统史学的单一解释局限。

跨学科思想,是年鉴学派针对传统史学弊病而提出,强调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 and 概念,历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力求驾驭一切社会科学,产生了许多交叉分支学科,如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气候史、环境史等,在跨学科研究中,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需要灵活选择研究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学,激发了历史学的活力,推动了史学革新,对20世纪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时段理论,是布罗代尔对时间的概念化处理。他完全抛弃了传统的一元时间观,将历史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间,拥有不同的变化节奏。长时段,就是自然时间,超越历史事件的范围,是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作为衡量的现象。中时段,就是社会时间,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系列事件组成的时间。短时段,就是事件时间,是迅速变化、丰富多彩的偶发事件。从总体史的观念出发,布罗代尔非常重视长时段理论,把秩序和结构置于个人的活动之上,打破了历史时代的机械刻度,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更新了史学观念,使史学家能够更好地深入历史。

问题史方法是年鉴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传统史学“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而提出。年鉴学派认为,兰克传统史学的叙事史方法,仅仅描述叙述了历史,缺乏对历史的明确解释,直接导致历史认识的表面化,阻碍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因此,年鉴学派倡导问题史方法,强调分析和提问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解答问题、证实或推翻假设又提出新的问题和假设这一程序的基础之上。问题史方法推动了史学科学化的发展。

年鉴史学以其对传统史学的反省批判,打破了学科的分野与限制,将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统计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全面引入史学,将研究对象囊括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的外延,这种“新史学”流派的影响,在20世纪国际史学界历久不衰,成为最具有世界影响

的史学流派。

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虽然使史学科学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其总体史的方向走向极端,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热衷于研究所谓“静止的历史”倾向,在史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与质疑。新一代史学家号召“抛弃传统的包袱”、跳出“长时段的樊笼”,注意个体、细微的短时段,微观史学由此在史学界兴起。

1980年代以来,微观史学在意大利产生并发展,成为在西方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意大利的乔万尼·列维、卡尔洛·金兹伯格、卡尔洛·波尼、爱德华·格伦迪等是主要代表。受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年鉴学派史学家雅克·勒维尔、贝尔纳·勒庞蒂曾专门讨论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分析问题,从而发展了微观史学的若干方法,他们成为法国微观史学的代表。

意、法等国微观史学家有鉴于主流量鉴史学存在的弊端,率先突破年鉴学派总体史观,将研究对象与视角投放到具体人物与细微的史实上来,他们记录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微观史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细微具体,十分重视研究成果的生动叙述形式,以便能引起更多的普通读者的兴趣。在微观史学家的努力下,诞生了《奶酪与蠕虫》、《中世纪的时间、工作与文化》、《理解中世纪》、《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等一批不朽之作。

日常生活史,则是1970年代中期以来在德、法等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史学流派。西方日常生活史学的兴起,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同时也是欧美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法兰克福学派曾将日常生活视为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勒菲弗尔在《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两部专著中将日常生活视为哲学革命,匈牙利学者赫勒的《日常生活》堪称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研究的代表作。文化人类学则直接对日常生活史提供了学术研究理路,要求与研究对象的“感同身受”、强调“他者”立场,以主观分析来“重构”历史,甚至在研究内容上也几乎全盘接受。

日常生活史学家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中世纪史这一薄弱领域,很快产生一批佳作。约瑟夫·吉斯·弗朗西斯·吉斯夫妇的《中世纪城市生活》、《中世纪城堡生活》与《中世纪农村生活》三部曲成为日常生活史的拓荒之作。1990年代,杰弗里·辛曼《中世纪欧洲的日常生活》、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保罗·纽曼《中世纪日常生活》等问世,揭示了从食谱到

饮食习惯、消费习惯,从大众休闲娱乐方式到居住史、性生活等许多中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展了其在欧洲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影响。

在1980年代以来三十余年的探索和努力中,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以其研究视角向下的取向,对中世纪欧洲日常社会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在史学界形成了能与强调整体、宏观的全球史观相得益彰的史学流派,史学界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日常生活乃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日常生活史以个案、历史文化的研究为旨趣,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微观分析,透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关注历史的主体——“人”,从而对20世纪欧美学术界主流学派——年鉴史学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全球史观构成了重大挑战。

新史学与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流派,彼此互为因果,相得益彰。新史学家所作的宏观研究深入揭示了历史的深层结构、宏观过程,以说明历史的本质,但忽视了许多无法重复的特殊史实,特别是对历史主体“人”的忽视,致使历史失去了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本来面目。而微观史学的兴起,正是对新史学抽象性、概括性的纠偏,然对具体人的行为加以重彩浓墨的描述,却也往往走向了“见木不见林”的另一极端。

二、日常生活史学、新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1980年代以来,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学针对年鉴史学总体史观,否认宏观、整体的一致性,力图通过细微、具体、日常的人或事来描摹叙述作为社会多数的普通人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十分重视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对农民、市民、下层教士及边缘群体越来越关注,关注他们的私人领域、私人生活。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新文化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以批判新史学现代性作为开端,新文化史应运而生。新文化史将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现代性史观专项讲究叙事、注重细节的人文主义史学方法,力图对政治、经济等总体史观进行文化阐释,因此,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份、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等都得到重视,从各种文化符号或标志入手,对其作深入解读,剖析政治与文化间的关系。新文化史眼光向下的取向,重视独特的文化符号,解构现代的权力体系,着力揭示权力结构背后的文化因素,由此引起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在充分借鉴吸收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后现代思潮史学流派对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代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与挑战。弗朗索瓦·多斯指出:“最重要的断裂表现是对历史知识的解构,对整体观念的放弃,从而使历史

从单数变成了复数。”他甚至认为由此导致了史学学科“内部的重大裂痕”：“一些人主张细碎的历史和照搬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全面的历史和在吸取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保持史学的根基，即追求总括的雄心。”^[1] (P234, 239—240)

新文化史在欧美学术界引发了史学转向。许多学者直接将民间崇拜、大众宗教作为研究对象，姜士彬、黎安友、罗斯基所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就对戏曲、印刷、宗教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文化人类学考察，以此来揭示大众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权力文化关系。孔飞力《叫魂》、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大众文化为切入点，研究大众文化对政治权力产生的影响。叶文心以上海银行职员时间和集体空间为视角切入，反映上海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变迁，探索其在现代化演进中的变化。史景迁《王氏之死》则是新文化史学个体微观研究的典范，细致详尽地描摹了山东郯城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来的暴利史》则对湖北麻城的革命史作了叙事史书写，探索下层民众的集体历史记忆、文化传统。

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带来的史学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取向的转向，使大众、下层成为越来越多史学家关注的对象，由此带来研究对象日趋细微具体，产生了所谓的“碎片化”现象。

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同样也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从其出现背景来看，是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在中国复兴的产物。社会史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运动转向经济建设，史学界摆脱革命史、政治史等“宏大叙事”转而探究中国社会演进历程及其根源的必然。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则着眼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通过研究重心的“下移”，即由偏重上层政治事件与政治精英，转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及大众文化。1980年代初，由反省现代化引发了文化史的复兴，继而形成了整个学术界的“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思想得到重视并全面梳理。1980年代中期，在四个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由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出现了社会史的复兴。社会学在中国得以重新找回存在的价值，社会史也在史学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史学的表面繁荣中，也面临发展的困境，文化精英的思想疏离于大众观念及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缺乏对历史主体的关注，造成“人”性缺失。史学界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探索两者的有效结合，进行交叉研究，“社会文化史”应运而生。

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旨趣取向上，已经为中国史学转向微观指明了方向。尽管

学术界对“社会文化史”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上都循着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2]。

三、社会文化史与碎片化的史学

随着史学界对外交流步伐的不断扩大，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碎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确立了学术地位，而以新社会文化史为特征的后现代史学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并于21世纪初被中国史学界不同程度地吸纳、接受。柯文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主张将中国历史从纵、横两个向度分解，从整体的中国区分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开展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或把中国历史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书写与研究。受此影响，西方新文化史家在选题方面往往致力于个体史、微观史的书写，孔飞力《叫魂》、史景迁《王氏之死》、何伟亚《怀柔远人》、萧邦奇《血路》等一批著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性成果。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史学界影响力深远、活力四射的热门领域，所带来的研究路径、叙事风格的转变尤为引人注目。社会文化现象纷繁复杂，具体琐细，故而研究对象的选择必然关注具体微观的论题，从而形成了微观史、深度描述的趋向。许多研究者着眼于具体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迥异于以往的新史料运用，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揭示日常生活方式、社会边缘人物行为背后深刻隐含的社会文化意涵，个体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造成“碎片化”的假象。

具体而言，社会文化史等新兴史学的“碎片化”表现集中在选题小而微，缺乏深刻而宏观的问题意识；论证阐释流于形式，无力揭示具体表象背后深刻隐含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历史价值，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理论及逻辑缺乏，无力建构本土化的史学范式。

上述这些“碎片化”的症状，在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但大可不必过于悲观。因为在史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个案与综合，历来是史学研究的不同取向。史家根据自身的旨趣、掌握的材料以及叙事能力等因素，分采不同的方式，均能呈现历史的不同面相，实无所谓高下之分。

当然，“碎片化”陷阱的出现，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史在理论建构、解释模式等方法论方面的薄弱，需要通过不断实践来尽量弥补短板。为此，有学者提出以联系论、网络论、整体论、建构论及选择“中观问题”等方法进行矫正，将一个个“碎片”连接成为宏观研究的“珠

串”和“网络”,由此避免陷入“碎片化”的泥沼^[3]。总之只要在精细研究过程中心怀总体,在走向总体的过程中出现“碎片化”阶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参考文献]

[1] 弗朗索瓦·多斯. 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

(张立程(1977—),男,山西应县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 李长莉. 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J]. 学术月刊 2010(4).

[3] 李长莉.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 年反省与进路[J]. 安徽史学 2015(1).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ZUO Yu - he

Chairman's words: In the 1980s new cultural history appeared in the world, and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appeared as a new discipline and perspective in China also in the 1980s. Now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but theory and method are backward and no classical work was published. In addition to them, there is a bottleneck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o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many conferences to discuss “new trends in the Western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China's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Here are four papers that cover the main point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give a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new cultural history;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new trends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

版 权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内外文献索引、文摘和全文数据库收录,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